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十三）

本书作者遇罗文是遇罗克和遇罗锦的胞弟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不知道1967年初曾有过一份《中学文革报》出现在街头，上面刊登过一篇不同凡响的《出身论》，而这篇反对“血统论”的文章的作者遇罗克，却在1970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了。《中学文革报》实际上是遇罗文等几个中学生私自办的，这张只出过几期的报纸，现在已被世界上若干著名的图书馆珍藏。

凡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人，都会记得遇罗克的冤案得以平反，并且，有遇罗锦那样一位女作家，连续发表出《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等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引起过轰动与争议。后来遇罗锦应邀到当时的西德访问，在那里留下，直到我写这篇序时仍没有归来。

仅仅是我上面所开列的因素，相信这本《我家》便会引出众多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

其实，遇罗文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他自己，还有他弟弟遇罗勉的人生遭际，虽然没有遇罗克和遇罗锦那么具有爆炸性的雷声眩光，却也相当坎坷诡谲、惊心动魄，反映出上个世纪后半叶相当大数量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轨迹，具有典型意义；因此，这本《我家》，确实是值得我们作为历史个案，仔细加以检视、研究的。

遇罗文写出书稿后，请当年他家的邻居任众写了一篇文章——任众的遭遇曾被我写成《树与林同在》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任众在文章里，把遇家的遭遇和他自己，以及许许多多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们生命轨迹交汇在一起，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和“不能让悲剧重演”的肺腑疾呼。我的心弦当然也与此强烈共振，但任众讲过的话我不拟重复，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遇罗文的这部著作还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都已置身在一个崭新的世纪里。我们沐浴着新的曙光，但无可讳言，我们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希望使我们兴奋，问题令我们焦虑。有些人士，把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推行，视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重要的事件，提出“历史为零”的论断，呼吁“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跨国资本的运作如大象巨脚，正无情地践踏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个性；而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确也是在公平的“游戏规则”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已“玩”得人心心跳——仅这两大问题，就引出了深重的焦虑，焦虑者为了化解自身的焦虑，并以己度人，力求达到清明澄澈，有的就如饥似渴地从历史中抓取“可利用资源”，上个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重要的“资源”之一，比如，有的人士就提出来这样的论点：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他要解决的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另一个呢，是“民间”的“文革”，所期盼解决的，是官僚主义压迫、特权思想与特权制度等等问题；主张有“民间文革”的论者，所常常举出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初期，一般民众在享有“大民主”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自由发言”。在某些人士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民间文革”那“全民参政”的实践，还有当时对跨国资本的坚决排拒，以及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所获得的可触摸成果（如南京长江大桥和大庆石油开发），都提供着“零历史”境况下，从事“制度创新”的借鉴，至少是能以激活灵感。好了，现在我们有了遇罗文的这部著作，从他翔实详尽的回忆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时像他和他哥哥那样的社会存在，是怎样利用时空中的可利用瞬间缝隙，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和“自由发言”的，并且可以了解到，为此他们分别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还可以从他父母，他姐姐和弟弟，以及他自己在他哥哥被杀害后，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引出深重的思考：从中是否可以找到抗拒全球一体化的

悲壮之美，或能以提炼出“创新资源”？遇罗文写作时并没有跟我交流过，他完全没有我上面所陈述的思考前提，只是客观冷静地回叙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里，已然成为历史的种种细节，他本身并没有参与是否存在“两个文革”的争论，也并不清楚“历史为零”与“制度创新”之类的新论，但我以为，他的这个文本，在有关的讨论中，具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参考价值——讨论的双方，甚至都可以从正面引述他的文字，以为立论的依据。

像任众那样的“过来人”，所时刻提防的，还是那些整过人的极左分子。这种戒惕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必要的。但实际上那样的一些人从年龄上说大都老迈，从社会站位来说也多半已然被边缘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似在与日俱增，但却回天无力。真正能左右现实中国走向的，应该说已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而这些人里，有的六十年代才陆续出生，全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生命体验，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中，以及后来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过程里，“拓荒牛”们所遭遇的那些阻力，对于他们来说，也了无印象，他们其中一部份人的思考与行动，似乎更多地，会受到现实中负面存在的强烈刺激，以及从西方——比如法兰克福，以及实际上也是用财团的基金支撑的高等学府那类地方——传进来的某些高超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某些独特的思路作为，这有令“过来人”理解、尊重的一面，却也有令“过来人”不解、担心的一面。遇罗文的这部著作，我以为应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参考材料——毕竟，这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具有典型性的，而且还活着，并继续生长着的历史。我祈盼，新一代的中国思考者与行动者，终能具备睿智的头脑与坚实的脊梁，离开误区，面对国情，实事求是，稳健推进，掀开这东方古国闪烁着新辉的一页。

~~~~~  
【往事追忆】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二之二）

• 张 敏 •

主持人：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八月的回忆与思考”特别节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在文革中，这一天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在以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里，中国大陆数以万计的人，或者被活活打死，或者由于不堪被批斗毒打而自杀。

在一九六六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最早地掀起红卫兵运动。我们都知道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和后来成为作家的张承志……，他们当时正想找到一种怎么样来表现自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加入到这一场人生难得碰到的一个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这么一个革命运动中，变成一个先锋。

当时卜大华正好看六月五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批判当时美国的副总统的文章《汉弗莱的哀叹》，那里面第一次引用了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一条语录，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的一句话，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卜大华一看这句话，就好像被一道闪电照亮了，马上就明白了，找到了他们的法理的依据。

他叫来骆小海、张承志，他们一看，他们就觉得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他们马上要成立一个组织，就跑到圆明园，说叫什么名字，张承志想出来叫“红卫兵”。他们写信（给毛泽东），但被当时学校压制，又写一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然后通过渠道往上交上去。

实际上，也不能说是学生单方面的。上边派了很多，像当时康生、江青，以及他们下边的林杰、关锋，和更小的这些红色情报员，都在替毛泽东想办法，怎么能够发动群众。拿毛泽东的话来说，让社会乱起来，把敌人乱起来，浑水才能摸鱼。怎么才能把他们弄乱呢？最好有学生能够冲出来。但是，你得找到一个契机。正好他们这个三论造反有理的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真是天赐良机，对双方都是这样，一拍即合。

毛泽东给他们写了回信。当时王任重赶紧跑到第一线，实际上王任重当时也为了表示自己跟毛泽东革命路线跟得紧，跟学生首先能够结合在一起。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跟卜大华、骆小海他们说：“毛泽东支持你们，他看了你们的这些文章。”但是，王任重又说：“我的这些话你们不能记录。”

他们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杨勇将军的儿子杨继平从他爸爸那边也拿到了这份文件，在电话里逐字逐句读给卜大华，卜大华就第一个得到了毛泽东这份有力的支持的一个文字的东西，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我支持你们。”有这一句话也就够了。

张郎郎：在这之前，老红卫兵和其他的同学当时在辩论关于对联的问题，这时老红卫兵马上就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实际上当时中央只是为了发动学生，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中学红卫兵正跟我们这些大学生和部份中学生辩论血统论的问题吗？他们知道，但是中央文革就是装聋作哑，不说他们错，也不说我们错，拖着。因为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有很丰富的经验，每次运动开始，一定要利用勇敢分子，让他们冲出来。这时候，不能压制他们的所谓“革命热情、革命积极性”。实际上，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

主持人：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对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宋彬彬谈话，这个至今很多中国人都还记得的历史细节做了分析——

王友琴：六六年的八月十八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份红卫兵代表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后知道她是叫文质彬彬的“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在这之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曾经一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这个学校发生了最早的把老师打死的事情。

在八月十八号之后，这样的暴力迫害大规模地升级。从八月二十日以后，死亡的数字剧增。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北京每天都有几百个人被打死。我们知道，作家老舍是在八月二十三日那天被打的，然后他自杀了。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到九月初，这是一个最残酷的、最血腥的一个时期。

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过程是和毛泽东的鼓励和引导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在有的学校，暴力行为比别的学校更严重一些？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由毛泽东发动的一个革命，是一个从上到下产生的一个革命。像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清华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在这些学校里边有一些学生的父母是高级干部，他们也比较早地知道发动文革的这些消息。红卫兵在最早成立的时候，他们的领袖人物也都是些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晚上，在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以后，当时中学红卫兵的头头就到北京饭店，向当时的北京市的领导人吴德报告了这件事情，吴德也一定向更高的领导人报告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有很多内部的报告，

差不多每天都报告说，今天在北京打死了多少人，所以上边当然是知道这些情况的。

在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以后，当时的北京市委的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都曾经派人到这个学校来看这个情况。但是因为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人到广播上，或报纸上来说：“这是不可以的。”相反的，我们却看到，在八·一八，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事情得到了鼓励。这些打人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大众面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制止，甚至这些红卫兵的领导人还得到了这样特别的荣誉，这里头隐藏的信息和指令，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张郎郎：实际上，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他已经说了，就是在短期内实行红色恐怖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一下把这个运动搞成一个让所谓的敌人胆战心惊，然后他好搞他的运动。接着是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北大附中的这些红卫兵他们也写了给毛主席的信。据说“破四旧”这个词就是在彭小蒙给毛泽东的信里面写了这句话。毛泽东马上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抓住了这个词加以发挥。

现在据我具体地问了当事人，尤其我走访了彭小蒙、宫小吉，当年的英雄，他们很明确地说，他们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在一个抽象的革命阶段，根本没有想到，还要用一番血和铁的这么一种所谓革命实际行动，来效忠中央。宫小吉说得很具体，实际上是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找到学校来说：“你们怎么还没去呀？人家城里边都去了。”就把他们叫出校园，告诉他们，你们到谁那儿去，去抄谁的家。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已经落后了一步。那么，第一个开始打死人的，王友琴研究的很清楚，就是师大女附中率先打死的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师大女附中位置就在北京西单、二龙路，就在街道上，就在胡同里。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比刚才我说的上述两个学校还要多。师大女附中率先出击，实际上她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她们也在想，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他们跟毛主席跟得这么紧，那么我们怎么落后了。这个时候，知道毛泽东要破四旧，那怎么叫破四旧？她们就回去揣测这些长辈们的心态，而且去看那些各种内部参考，大家再对号，想出来了：向走资派、或者是向社会发出冲击。

〔插入文革歌曲录音：（众女声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齐唱《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张郎郎：她们一下打死了校长之后，实际上这时候对于政府来说，完全有选择的机会。按照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十六条”，明确地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么，这个时候中央只要出来讲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警察来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打死人的事情要按照法律处理，那事情马上就会压下去。

这个时候，等于全市的、或者全国的红卫兵的眼睛都在看着政府打算怎么办。也就正在这个火头上，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就打死人的这件事，明确地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你想想，这些党员，这些公安局的负责人，谢富治用路线斗争、犯错误来压住他们，实际上意思已经明确地告诉你们，公安局不但不对他们绳之以法，而且根本不管，谁要管，就犯错误。在这个会议以后不久，还是在八月，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领导人的会议上，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

，还是公安机关批准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的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说的已经不能再露骨了。

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赵怀海先生，他是当年的一个老红卫兵。他就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他第一次参加抄家的事情。跟前面说的谢富治的讲话完全是呼应的。当时，他们睡到晚上十二点多，是街道打电话叫他们出去说，现在有情况。他们去了以后，街道委员会的人在前面带着他们，告诉他们到那家去。旁边站一个警察，站在阴影中，因为警察不能公开站出来，意思是他在配合他们。然后告诉他们，那家是天主教。

真正的恐怖高潮，据我的了解，是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在他们去崇文门那边破四旧，有一家人他们后来就是忍无可忍，有反抗的行动，结果全家被打死。那个事情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左右发生的，那事情掀起打死人的高潮。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信号，红卫兵马上撒出无数的传单，说阶级敌人开始报复了，就走上了街头。在那个阶段，我们在北京，可以说没有人没看到鲜血，到处都在打。官方的统计，一共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好像远远不只这么小的规模。我们当时恐怖到什么程度？我们因为是反对对联，被红卫兵看成是眼中钉。有几次，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扬言到中央美院来抓我和邓琳。当时，我本来想躲出去，但是我们学校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勒令我必须留在学校。那时候，跟我一个宿舍有我，还有后来在哈佛大学学美术史的巫鸿，还有现在在香港大学教书的万青力，我们三个人留在宿舍。因为巫鸿家里出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万青力家里好像是地主，我家是黑帮，等于我们三个人不能动的人。这时候，我们就听见旁边打人的惨叫，旁边正好是东安市场，那儿正在破四旧，到处是杀声。当时，我们就躺在那儿，一夜一夜都睡不了，不知道下一秒钟会不会来抓我们。这时候，万青力曾经建议，要么跟我回老家，我们河北老家的农民比较好，咱们能够在哪天晚上逃跑。现在想想后怕，还幸亏没去。后来，大兴那边整个一村子的“黑五类”，男女老幼全部被杀死。

当时二十四中的一个中学生吴尔鹿偷偷跑来看我们，他的脸就吓得煞白。他说，他看见他们同学怎么把一个所谓的流氓，一个学生，当时可能已经被勒令退学的，结果，他们把他叫去，把他的那个所谓背头，就是头发长一点，当时有点油，那就算流氓，必须把背头剃掉。那个年轻人，他好像不太服气，结果几个红卫兵按住他，另外的学生拿推子给他推，他还在那里挣扎，那学生一气之下，把推子就往他的延髓整个就插下去。那个人当时就倒在血泊中，就没再动。后来，周围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红八月”，最恐怖的那个阶段，我们路过帅府园拐过去叫煤渣胡同那边，在路灯底下，我从那过，我一看，那个人的头发怎么是紫色的？我想，那个是不是个外国人？稍微进了一点看，原来是一个老太太，她是白头发，她跪在那儿，鲜血把头发都染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我赶紧扭头就走了。在那种环境下，就像德国法西斯马门教授那个时代的话，你别说挺身而出，你自己都自身难保。现在我的有些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写的我对打人问题的看法，谈几方面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在学生或者红卫兵这方面，是他们一个青春骚动期。另一方面，他们急于参与权力分配，或者是想当一个时代的英雄。

当时我和联动的这些人一块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运动初期那时候，总理接见我们，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完了还不捞个中央委员当当？不是一个人这么想，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一种要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的这么一个劲儿。从官方这边说，利用他们下面的布置、安排，在什么阶段可以开始打人了，故意放他一段。实际上，你看“红八月”很多人说“失控”，实际上没有失控。到了十月份，陈伯达出来讲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血统论，《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社论和批判文章。一下全国一面倒地压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红卫兵恐怖已经用够了，下边

要用别的了。在这两种合力形成的时候，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授权的过程，突然宣布一部份人不受法律保护，所谓“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所谓“要想革命站出来，要想表现就去打死人”，就是授给他们这么一个权力的过程。谢富治的话等于宣布，中国的所谓“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不再受法律保护。因为他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根本不管。有了这么一个正式的授权，才使打人、把人打死能够推到一个高潮。

主持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近日就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发表最新研究资料。他认为，中国大陆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在二百万以上，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丁抒：广东作家秦牧曾经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美国的 R. J. Rummel 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章中丧生的数字大概为七百七十三万人。我看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我相信应当是二百万以上。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这个“横扫”造成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应当接近一千万户。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范围的恐怖。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的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们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二日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远弗届，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该不下十万，更多的人自杀了。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那么样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六月中旬，毛泽东曾经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恐怕也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毛泽东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比如，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到处都有被逼迫得走投无路而自杀的人。八月二十四日，作家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千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数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超过毛泽东所说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张郎郎：当时我的中学的班主任，外国语学院附中的班主任张福臻，他被拉到学校里面打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当时别人把他女儿拉到那儿去，让他女儿必须亲自动手打她爸爸。你想她能不打吗？她一边哭一边打，她也得打，直到她爸爸被活活打死。震撼我的、最凶残的就是，张福臻老师眼睛先被打瞎了，他人已经体无完肤，最后人们散了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死，他就往家爬，最后爬到自己家门口，死在那儿了。一零一中的美术老师陈宝琛是被扔到学校中间的那个喷水池里，红卫兵站了一圈，在外边拿那个武装带和木头棒子，把他头按在水里不许抬起来。

他呛得受不了，起来，他们就打；不抬头，也打。最后，那个池子里边血和水都混在一起，也分不出来那是他被打的血，还是他从肺里呛出的血。总之，他就死在那个喷水池里。

我们每个人观察的角度，有很多使人震撼的东西，一定有它最真切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它回忆出来，写出来，不能把它忘记。

王友琴：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红卫兵学生作了一个歌，叫做《牛鬼蛇神歌》，在学校里面强迫这些老师唱。后来，这个歌从北京一直扩散到全国，歌词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我敢乱说乱动，人民就把我砸烂砸碎……”这个歌只有十句歌词，可是，在我问这些受害者、被强迫唱过这些歌的人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忆出这歌词的全文。后来红卫兵学生告诉我这个歌词的全文。当是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老师他们忘掉了这个歌词？因为这些东西是太痛苦了，这个侮辱太深重了，所以，他们就把它从自己的脑子里给删除掉了。这是一个心理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文革的三十年之后，我们要对文革做一个非常理性的、也是有道德的研究或者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还原这些历史的真实的事情。

主持人：长期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在《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中说：“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他说：“研究文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比起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反省和忏悔，日本人的态度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愤怒，因为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暴行缺乏认真负责的反省。但我们亦当自问，对于被我们称为一场浩劫的文革，我们又作了多少认真的反思呢？”“文革中的受害者大多数现在还活着，积极参与、狂热投入的一代人，现在正是中国的社会中坚。但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个所以然呢？不仅研究者持上述看法，现在，海内外很多人士，也看到进一步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现在在北京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一位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学生说，对我们民族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认真研究、吸取教训，总是遗憾，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也不利。

北京大学附中的校长叫刘美德，当时她怀孕，有一个学生就叫她跪在一张桌子上，然后有的学生站在她的背后，把一只脚放在她的背上，摆好了这样的姿态，记者来照相。他们说，这是为了实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要把这些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照完相以后，他们就一脚把这个女（校长）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刘老师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这就是当时的人的心态。可是，现在没有人去道歉过。这些非常残酷的、血腥的迫害对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后来大家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精神的伤痕是更深重的。在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自责，没有自我的反省，那么我们良心上的这种污点是会永远留在那儿的。

主持人：现在在美国洛杉矶担任经济师的原北京一零一中学学生朱青鸟文革中父母都被作为走资派抓起来，当时，她上初中一年级，只有十三岁。后来，她在海外皈依了耶稣基督。回忆文革遭遇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也有应当忏悔之处。在美国加州政府机构担任官员的艾迪先生反省说：“在文革中，我是家庭有问题的，没资格打人，但我也是软骨头。”

王友琴：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有一些人对于死亡，对他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得非常的冷漠，甚至都已经忘掉了。这其实也就是文革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因为人的生命，法律程序这些东西都被漠视了。甚至就连有些人他们不赞成打人，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些革命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枝节问题而已，那我想这对我们的良心道德感是一个非常大的扭曲和非常大的摧残。



主持人：现在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自由撰稿人、台湾《当代》杂志编委仲维光先生说：“想起文化大革命自己当时的表现，直到今天，内心还在疼痛。”

仲维光：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东西，一方面对自己在当时的表现，内心中到今天想起来还在疼痛。我们当时怎么会那么愚昧，那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清？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工作，也许就是来反省自己这个时代和历史，能够得出一些教训和经验，使我们的后代能够更像一个人那样地生活。在我后来，九四、九五、九六年我回国的时候，再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和大陆的很多东西的时候，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呢，在社会主流里头人生的扭曲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同程度而已。它实际上是四九年以来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继续。在文化革命它不过是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但是，文化革命后，对文化革命的反省从来没有认真进行过。

本世纪出现了两个极权主义，一个极权主义就是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另外一个极权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而中国红卫兵现象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一个表现。共产党社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剥夺了人的责任心，摧毁了一般人的伦理概念。他们把自己做的各种坏事都推到社会原因，而不去自己负责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担了一部份责任的话，那么共产党社会也不会像文化革命爆发的这么没有任何阻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就能够阻挡住共产党社会的很多丑恶东西。这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为真理而生存，或者生活在真实中。”

主持人：当人们在回忆与思考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时候，也追溯着那些当事人这些年来踪迹。陆文禾博士说：当时那些打人的人，那些红卫兵该下乡的时候，他们不下乡，去参军去了，该上大学时上大学，该出国时就出国，反正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现在当资本家也是他们。

艾迪先生说：到美国来的好多（当年的红卫兵）啊，改名的改名，献袖章的那位也改了名了，那也是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最早成立红卫兵那位也在美国，好多都在美国。他们也背弃了他们当初的理想了，也不要求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了，那么他们得罪了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向他们道歉，并不是另外那些人吃亏了，是他们自己吃亏了，他们一辈子在这个阴影下。

陆文禾：总的来讲，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太老实的民族，对待自己不说实话，骗来骗去，还是骗了自己这个民族。打人的人不道歉，还有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看，没有出来阻拦的人也不谈这件事情，没有很多的正义感，自己做错了事情就掩盖一下，只要是跟自己不相干的别人受苦，他不会站出来说什么话。恩格斯讲，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人对这些事情有些反省，希望还总是有的。

仲维光：当年老红卫兵，他们在今天站在权力的位置上，他们当年的特色我觉得还是很明显；要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我们曾经同一个部长的儿子聊起来，他在当时社会地位也不错，他跟我们讲，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父辈那种对马克思主义虔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具体的人，也有平民子弟投靠到干部子弟那边去，主张极权，反对人权，在我的同党里头就有这种人。在我们学校高中三年级里，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在当时是右派，他被老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呢，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他读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就积极地给陈云写信，给中央上层写信说，坚决反对学习西方，中国的路只有学习苏联，巩固专制。

总的趋势来说，享受特权的人要想让他抛掉特权是困难的，需要他自己做出牺

牲。正是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追求人权的干部子弟，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实际上，我们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既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缔造者。

主持人：张郎郎先生也谈了他的看法——

张郎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斩断了它这个政权和人民之间最后维系的这个根。所谓打倒“四个帮”以后，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契机，但是平了“民主墙”以后，到“六四”的时候，重新重覆了这个故事。实际上可以说“六四”的枪声和八月的打死第一个人，实际上的意义是一样的，给大家的信号和它的潜意识上的影响是相同的，就是告诉人们，你只能作一个不说话的人，作一个奴隶，别的是假的，权力是真的，维护权力就是暴力。我们要重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打人，和重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现在我们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全文完）

□ 原载《中国之春》

~~~~~

【专题研究】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50—60年代大学生与其特定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
——二谈两代大学生

• 漂 木 •

众所周知，5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当时大学生中影响面很小，学生中的党员很少，高校的党委负责制尚未确定，可以说，学生与中共关系不如60年代密切。与文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57年大学生无从从中共高层得到一系列明确指示，鼓动起来造反，学生主要是从本能出发。他们那时与中共官员很少能有文革中那样的空前绝后的勾通互动。

不过林希翎是个特例。林希翎16岁参加解放军，受共产党正统的教育，50年代初的社会，给了她优厚的政治文化地位。56年大学风潮来临时，据说她正与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秘书谈恋爱，当时轰动一时的是林希翎要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抄本，据说抄本就是在那秘书处偷出来的。更让人注意的是，美籍华人杨中美的《胡耀邦传略》中写道，胡耀邦自己证实，他曾与林希翎在57年交谈了四个小时，指出林的个人主义意识占统治地位，“她不听我的意见，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后来会遭到逮捕。”（1）这是迄今见到的唯一的57年学生领袖与青年工作要人有过的接触。此外，据说胡耀邦5月24日接见北大几位团员代表的讲话，被右派学生歪曲发挥为中央因鸣放出现分裂，在大学生中造成影响。北大谭天荣大字报就说“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领导起来……。”（2）毛批示有关材料“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57年中共中央内部认识分歧，已在后来海内外研究里被阐明。

而谭天荣的说法，66、67年由蒯大富们发出回响。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激进的红卫兵，每到文革发展关头，自认为“敌军围困万千重”，出现如同18世纪法国的“祖国在危急中”的局面，总公开宣扬中央内部斗争激烈，要准备和毛主席一起再上井冈山。57年还仅仅是大学生的猜测，文革里的这种谣传就决非无中生有，毛自己，特别是江青就多次吹风，让精神已非常紧张的红卫兵和民众对党的分裂要有准备。

57年右派学生，如北大王存心，提出人大制度“没有把第一种领导（意为行政性）给予共产党”，“实际上不论共产党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权。（3）这一典型的学生右派认识对共产党的执政的文化性质提出了怀疑。

66年的大学生，没有去思考这种问题，他们造反之初，恰恰是纯真地以为在努力维护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胡耀邦与57年大学生自由化的纠葛，看来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不过他这个人的品质、风范的一贯，可见一斑。

◇ 一、上一代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英雄崇拜

由于历史的局限，57年学生与中共的勾通，时间与空间的延展性都无可与文革相比。文革贯穿了中共力图组织和控制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互动，派别的产生和党群的陷入，革委会夺权反夺权，学生的政治参与及其和党组织党员的思想文化关联勾通，远远超过了文革前的17年。本质上，是共产党多年的政治教育，造就了一代理想青年。其次，从57年后完善的政治文化衍生而来的所谓极左路线和反抗，促使学生与上层政治及各级官员勾通互动。

毛的鼓励动员，“要关心国家大事”，使得学生的个人反抗，很快汇聚成当代“勤王义师”，冲击党的思想组织，摧散各级机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实质上是毛组织的思想文化起义（行动和形式上往往又派生暴力），在当时的中国，哪怕是主观上非常温和的政治文化起义，必然导致夺权。在运动初，仅仅是诸如蒯大富少数造反中坚看到这一点。后来，文革派的主导性宣传高度肯定夺权，造反学生力图进入新产生的共产党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文革的火线入党，就成了主客观的必然。

所以，66年大学生与毛泽东、中共的关系，超出用“密切”二字的概括。

首先这里应提出所谓对毛的个人崇拜问题。一代人对毛的信仰崇拜，不能脱离他们生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长在中共红旗下的背景。一代人听闻甚至目睹了国民党政治、军事的溃败。笔者就在启蒙认字之前，惊闻渣滓洞的枪声，目睹“国军”一夜抢劫后的鸟兽散，也提前文化革命17年带上“八角帽的”毛泽东像章；亲见刘伯承、邓小平检阅解放军入城式。共产党和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是由胜利的革命战争客观地也不可置疑地确定的。在中学时分，这一代学生，洋溢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情：“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党及革命的感情，与“党和列宁”融为一体。

斯诺的《毛泽东自传》（抗战时印刷的土纸版本），曾在部份干部、知识分子子弟中传阅。这部口述传记，文革中才被红卫兵大量翻印流传。60年代还有一些其他传记，比如李锐写的毛的青少年时代。这些读物，使一代人与早年的毛在心灵上相通；为在神州大地上去理解甚至拥戴晚年的毛，打下了潜在的基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代表人物周泉缨（毛在68.7.28接见五大领袖时提到他），他在当年已对文革极左、中央文革表示某种公开不满；但在30年之后，他居然仍认为“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毛是共产党内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4）

综观今古，大学生难免有“千古一帝”的冥想。恰如施拉姆所言：“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形成一种混合或者说兼收并蓄的政治文化，把领袖看作‘天子’这一传统观念，在这种文化中仍占据重要地位”。（5）某种意义上的崇拜，脱离不了60年代在“帝修反”的政治围剿中，中国“独立寒秋”的“光荣孤立”的文化心态背景。1963年得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白皮书，书中

述及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和迫害，已不会造成笔者震惊，相反的，倒是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留下了永生的印象：“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下来了。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我在文革中反复品味了这绝对正确的话，思考专制者言不其终的悲剧；而当时不一定思考这问题的热情的红卫兵，他们坚持的恰恰是这未读过的信义，投身自信不朽的壮丽的事业。他们并不如现在文人评诉的那样，是盲目追随专制崇拜。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最先被中央领导公开提出，有共产国际的解散的客观背景，而60年代中共试图重组国际共运大业，是激励新一代青年崇拜升级的必要充份环境。应当承认，大学生对批判斯大林而产生的疑惑，已被中共批评苏共的第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所压抑，林彪煽起的崇拜热也一度蒙蔽了青年人。

所以，大学生在60年代意识形态升温过程中，被培养和滋长了对毛的崇拜，文革运动本身，更在政治的大潮下，锤炼了这种崇拜，并推向顶点。需要强调的是，寻觅觉悟的大学生，是按自己的理解去崇拜毛泽东的。后来不少学生对毛的敬仰和佩服，是出自内心，特别是出自内心理念对时兴的政治理念的一种思考和趋近。运动中他们读了毛泽东著作，特别读了尚未发表的文献，他们自觉的去靠拢毛，去捉摸党内斗争。这就是一代人早熟的也是畸型的政治青春。要强调的是，与其说红卫兵当时陷入一种宗教性的狂热，不如说他们在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毛泽东，他们用毛与共产党的形像，表达出自己内心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不成熟的理念倾向。那时有支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可以说，多数学生还是出自内心唱这支歌的，他们用毛泽东这一文化观念，来标志了自己追求的正义，来拥戴一种保护普通民众和保护自己的偶像；他们曾显示出赤子的虔诚。这也是参加过文化革命的大学生对当年那段历史不得不沉默的一个原因，丰富的文化内涵，很难用一个政治概念就可以概括了完结得了的。对学生群众的领袖崇拜的概化型否定，多少也是出于一种“藐视群氓”的认识，低估了青年人认知过程里的主观作用。

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使一代人从反思浸透自己血液和心灵的法国启蒙思想、大革命，想到更多；想到从小崇尚的苏联十月革命，想到自己曾全力以赴的文化革命。西方文革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某些思路可资借鉴。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认为毛是卢梭和雅各宾主义的好学生；而卢梭为普通的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解说，不需要与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触，这些倾向可以自行其路。而毛，“一个能够确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人，已经成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承担者”。（6）作者坚持西方观点，卢梭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卢梭认为，只有当个人的意愿通过某种途径融于整体意愿时，个人自己的道德潜在性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和马克思从大革命掘取思想源泉，马克思找到整体美德的社会承担者——工业无产阶级；但他把不确定的、复杂的技术经济和道德进步融为一体。列宁则使政治问题又回到舞台中央。作者认为列宁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共同意愿。“他不断对准他自己的党，发现它的缺陷。这个机构已经很难再代替领袖的位置了”。到毛的文化革命时期，“第一是领袖和机构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比例关系，第二是卢梭主义者对道德的强调再次占据了明显的支配地位”。（6）不论作者的推理和表述如何，只要我们冷静地反思自己心灵深处的卢梭形像，对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的概括，哪怕是皮毛的折射和印象，西方学者的这种认识，是比较切合我们一代人的道德——革命取向实际的。文化革命在我们心中，无论是文革前史还是文革正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道德革命；毛泽东主席，则成了实现我们崇尚的传统美德的精神领袖。毛在青年时读了卢梭的书，毛的红卫兵也确有其人读过《民约论》，当年什么也难看明白；但今天这一代要重读卢梭的话，终会觉察了当年大学生拥戴的文革和她的领袖的观念，和二百年前的老卢梭，意念是何等的相通：“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新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份，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份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

上的独立的生命”。（《社会契约论》第二卷）

文革中，造反的大学生们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中共这么靠近。相应地，他们用刘少奇、走资派的文化、政治观念，来代表了自己反感的社会不公正。显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刘和所谓走资派，是极其幼稚和不公正的。到不惑、知天命时，当年的红卫兵倘能面对新的社会不公，或许他们会认为，当年所谓的走资派，比起80、90年代的社会蠹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完全被歪曲和冤枉了。

从自由主义来面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57年北大右派学生严仲强就有萌芽态的看法，“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7〕类似的情绪，也在60年代的大学生的一部份人中暗暗的弥漫，相对于高温的文革意识形态热潮，这仅是一种潜流，但恰恰是这一潜意识，涌动汇入红卫兵拥护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潮。诚然，红卫兵表述方式不同，他们竭力回避容易被混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观念的名词，而采用时髦的文革批判武器。

显然，所谓个人崇拜并不如某些文人描述的那样，成为红卫兵政治文化的首要特征。对于一场亿万民众参加的运动，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革命，单纯用个人迷信、个人感召力去解释，是肤浅的。在《晚年的毛泽东》一书中，王绍光关于文革的座谈，就认为：“文革前群众心理，主要是当时的高度集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老百姓却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按毛泽东的真正思想来的。实际上，各社会集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当时至少有两个毛泽东。……扩大点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毛泽东。说受蒙蔽，在大家都相信毛泽东这个角度讲是对的。但，你又不是受别的蒙蔽，是你自己有这个内心需要。”〔8〕

海外研究认为：毛本人无疑会宣称，在与党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中，他别无他法，唯有把他自己的威信和领袖的超凡魅力押在天平上。而且，他会提出如果有人要铲除官僚主义狂妄自大的优越感，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倡人民也能了解的简单思想以及推广一种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

以刘少奇为靶子批判所谓“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群众落后论”，兴起于批判“资反路线”后，其来由背景不太清楚，很可能有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授意指使，到目前尚未见公开发表的严肃考证与论证。仅是王力回忆1966年12月26日，毛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吃晚饭，毛曾谈到“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歧”。〔9〕我们需承认的是，大学生热衷于这类批判。大批判冲击了英雄崇拜和政党崇拜，又激活与强化了另一种崇拜。但人们羞于阐述和论证，大批判实际上瓦解了57年来形成与强化的极左的特种政治文化。传统要求青年人忠诚于政治，具体体现为忠于组织和某个人；而文革大学生认为忠诚于意识形态，是对理想、观念的追求，应是一种个体的思维行为，而非一种集体的思维定式。将追求囿于以某人来代表的控制，无异于将意识形态宗教化。这似乎是共产主义的加尔文派与旧教的冲突，贯穿运动初期。毛泽东本人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对错误的领导要坚决抵制，其社会效果远远超出对“50天”的造反本身，群众把它引伸到政治生活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从传统意识下得到了解放。

如果从文革后的校园思想发展来反思当年，大学生是自觉地追求这个自由吗，是否追求了某种自我实现呢。从观念形态看，大学生的躁动，表现出对绝对化意识形态的逆反，甚至当时一批好想问题的学生自发学习马列原作和搜寻西方文化书籍，也就体现出对僵化的原始冲击。

但不是自觉追求自我实现，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这些。这是人们还不愿意剖析其

真正心理的一代人。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泛滥的一代人。命中注定了他们将两种时代的美感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式的舍身成仁的革命英雄的理想主义时代（请注意，这些英雄中有几位因出身，或经历、或所谓表现，在英雄事迹发生的当时，并不一定被传统的政治所承认）；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的孙行者及梁山水泊侠义式的反封建——从而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主义时代。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人文主义倾向，而几乎又自信这就已经是那理性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的英雄崇拜是多源的，既有毛泽东，也有其他革命导师，甚至也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卢梭、拿破仑。多源崇拜就可能有多元政治文化的兼容，运动中出现所谓多中心论并不奇怪。具体在学习雷锋中，一些人热衷于所谓齿轮和螺丝钉精神，一些人热衷于关心大事和公共效益；到了运动高潮中，有的人鄙视埋头打扫清洁和甘当“驯服工具”，斥之并非雷锋精神，有的人强调造反派不务正业和野心勃勃决非雷锋真谛。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号召我们学雷锋，目的无非是我们能够从英雄形像得到启迪，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但事与多数领袖热望所违，不少造反学生从导师和青年英雄身上的道德所获，恰恰是一种强烈的反潮流精神。在学生的林立山头中，尽管缩影和折射了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特色，但不乏中国传统的绿林豪侠之气，反修防修大旗代换了“替天行道”的理想。但是，百川归海，一代青年找到了（有时是在自己内心中找到）毛泽东，这位永不停止、藐视以往的革命家、历史哲学家和诗人，毛泽东发现、造就、培养了这代青年。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和一股青春的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要不一场红卫兵运动，那才是最大的反常！大学生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革命，哪怕是反复与镇压在等待他们。66年7月初，某工科学生在日记中写到：“要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为了历史列车的畅行，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冲着障碍物上……”。学生认为自己为捍卫革命甘洒热血，而被视为障碍的人物却认为要制止右派翻天。思想冲突和结局将是何等的惨烈。从比较自觉的大学红卫兵当时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他们对17年体制初萌疑惑，并将对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怀疑搅在一起，他们把自以为理解的——从而也是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民主思想大断裂中的某些回响，以及又广泛存在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狂热、农民与平民的平均主义都混在一起。激起这种思想大激荡的恰是人们未必真正认识的人格化的毛泽东。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依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为适当。当然他们为这种联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缺乏现代民主的底蕴与教养。

代价的沉重体现在某一方面：一代人纯正的青春被扭曲了。他们狂热的真情和行动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也受到世界上几乎一切政治势力的攻击。他们的政治初恋虽然深埋心田，但总被这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政客、墨客耻笑褻渎。另一方面他们会半自觉地引导自己靠拢某种政治文化，无休止地和社会内部追寻失稳，在政党、政府和文化集团里明确批判目标，在自己周围人为地划分政治派别、等级、集团，党同伐异，搞人人自危，群起而攻之，唯我独尊，以我为中心；个别大学生甚至丧失了人格与伦理，这在当时派别斗争和后来武斗里屡见不鲜；尤其可怕的是有的人以政治上出卖同类来换得自我存在（或所谓革命的形像）。斗争反复，“鲜血染红顶子”一语成为时尚的攻击习语，就不奇怪了。红卫兵如果不引导自己去追随党内路线斗争，他们也就没有革命与存在的机会了。有的自觉去靠拢上层斗争中的某一方，自诩“路线觉悟”高，以争得出人头地，成为某种政治文化的工具与牺牲品。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充份地估计到红卫兵的非马克思思想形态的破坏性，他不断地在扼制、规范红卫兵的行动乃至思想言论。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只是要放大学生去打倒刘少奇，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他决不是要他们去摧毁整个党和现行的政治文化。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指出：“毛并不想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查，是对的；如果说它是在造就一个新的政治体制，

那是无稽之谈。”造反红卫兵的一个悲剧就是，他们从自发地反对 57 年型的政治文化开始，到缚上这一文化的战车，最后红卫兵的理念又被这种文化摧毁。（10）

尽管如此，他们不一定都认为自己从众随大流了，他们在已脱离文革运动旋涡之后，仍从毛泽东在党的十大提出的反潮流号召中，看到当年大民主青春峥嵘岁月的回光。但不一定真认识到红卫兵的组织路线与实际运作，并不符合现代民主的政党政治与现代法制。

毛泽东期望的是文化—政治的革命，学生与工人却准备迎接一场社会革命。那么，红卫兵与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是有冲突的。一方面作了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不驯服的。学生追求平民式乃至是农民式的绝对民主。从 66 年到 68 年两年的实际看，大学红卫兵和文革派的中央领导，是既同一又有冲突的，即毛常说的对立统一。毕竟红卫兵与毛泽东已是两代人，红卫兵执着的追求及理论上的混乱，最终仍会与毛泽东产生冲突。著名的 7.28 接见把问题摊开。红卫兵的反驯服工具、反奴隶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旦启动，惯量之大，不是毛泽东叫停就能作罢的。红卫兵从领袖、政党崇拜转化成对权威的冲击。

运动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仅仅热衷于批判红卫兵政治上的负面与某些丑态现象，回避与掩盖负面的本质和它的馈源，它的文化社会心理，把纯情的青年学生作为风车敌人来批判，显然是肤浅的，失公的，也是对文化革命历史的一种唯心主义。

◇ 二、造反有理与革命权利的抗争

60 年代大学生奋力投入造反潮流，造成其迅猛和暴烈的文化背景早已不应是黑箱问题。多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清晰地划出一条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红线，农民起义有理。可歌可泣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抗日的历史，充份说明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贵重的了。革命传统教育给一代人最深刻的，莫过于多年来共产党宣传崇尚的民主革命的精神激情了。60 年代正是二战后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阶段，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吉隆滩入侵，使得青年学生民主民族解放的热血沸腾，叹息苏共民主激情之花的凋谢。其间，毛泽东主席连珠炮似的声明一一发表：反对美帝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63.8.8）；反对美吴集团侵略屠杀越南南方人民（63.6.29）；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帝爱国斗争（64.1.12）；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64.1.27）……直到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68.4.16）。毛为支持亚非拉人民民主斗争，曾数次登上天安门，大学生一次次从海淀游行到天安门；从中共的领导到虔诚的学生，谁也没有想到这民族民主情绪的激化，正是在预演文化革命，或者可能继续强化文革。人们没有注意到，18 世纪一批参加和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的贵族青年，积极投身法兰西本土的反专制体制的革命。大学生从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汲取了争自由反压迫的理念。

但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和那时代时髦的政治敌人——帝修反的造反有理，为何会迁怒于教养自己的革命党呢？为何共产党自己教育培养的学生，会把对传统意义上的敌人的反抗，借用来对抗至今仍歌颂——比为母亲的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党呢？从社会心理看，青年人是在对父母至亲无明发火，无理取闹吗？

事实上毛在激励传统民主主义激情的同时，一直在鼓动造反。他难以与广大学生接触，却鼓励正在求学的侄儿女反抗学校的不合理规定，甚至造反。64 年以来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支持了学生的不满。65 年 11 月，在（去上海）路过济南的火车上，他对人说不要怕造反，他自己也是造反的，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就可以造反。66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即

毛在3月30日与康生、江青、张春桥批判“二月提纲”时，专讲了中央不对头，地方可以攻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8月1日，他回信清华附中红卫兵，申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8月5日亲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愤怒指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对群众——突出是大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毛在7月下旬与中央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时，批评中央派出的工作组阻碍了革命，实际上帮了反革命，有的坐山观虎斗，看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打电话电报，限制学生上北京告状。对于运动，毛主张可以电话电报通讯联络，可以派人到中央，这是党章早就规定允许了的。他在“炮打司令部”前一天，对中央常委说，自己命令学生起来革命，学生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从这次镇压学生革命行动，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1）

学生很快找到毛在延安时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迅即宣传开来，震撼了千万红卫兵和党的领导人的心灵。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笔者来到北京，顺便看望一位老革命的干亲；她讲到自己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经历，用工人革命家的语言告诉我，“自盘古开天，没见过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自己当权以后，还鼓励造反有理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到，只有毛主席能够作到。也只有毛主席才最了解你们青年人”。我明白，当时她努力想跟上运动；只有中共这真正革命的党才能始终支持革命造反，听后不禁热泪滚滚而下。

毛泽东几年来所说的造反，从吹吹风发展到公开的有明确目标的鼓动。他推动了对所谓50天“资反路线”的批判。这里当然不是讨论毛泽东是非的地方，也不是分辨这一批判是否荒谬的处所。

这里仅仅记录造反学生心目中的造反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

必须首先承认的是，大学生被时尚的政治文化熏陶，在文革一开始，他们决没想到反对共产党，也决不会反对共产党；6月初学生的大多数欢迎工作组，高年级学生自己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搞运动。他们以为通过工作组可以领导学校的运动，不让所谓黑帮仍然有权，破坏文革运动。如“波澜乍起”（12）中武汉水院类型的应属正态分布的多数。但是，北京的院校集中反映了上层有分歧。清华大学工作组进校接管党委职权后，竟出现112人被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局面；工作组要控制混乱形势，其作为受到一些师生抵制。（13）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引导打倒老院长高元贵，部份学生反对，导致与工作队的冲突。（12）实际上工作组的政治倾向受制于其派出机关，中央各部或各省省委准备保谁或抛出谁，决定了工作组的取舍。6月，刘少奇对刘涛说“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五十几所学校有9所反工作组，带普遍性。今天需明白的是：上级党委并不一定都是准备保护高校领导的，许多地方党委早就准备舍车保帅，或者借机惩治过去似乎不太买帐的关系不融洽的学校领导。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校长就是被抛出来的；广东中山医学院的第一书记柯麟，被广东省委抛出罢官，7月3日《羊城晚报》公开报导，并称省委早就察觉了柯麟、刘志明黑帮。柯原属广东地方干部，通过派工作队打击他，无非使陶铸反地方主义的极左做法获得了文革的合法地位。青年人逆反心理强，一些造反学生后来反而同情受上级打击的校领导。诚然，并非工作组都是真心要打所谓黑帮的；总的看，学校和上级党委，都倾向于打击知识分子和平时不大合拍的干部，乃至不听话的学生。造反学生在文革初火热的气氛中，眼睛始终盯着党的领导的某些人。工作组以引导为名，怀疑限制和打击最先起来批评学院领导的人，甚至打击还未能批评党委，仅仅是对运动作法稍有不同意见和不满的人。在造反的学生看来，不是学生先入为主的反对了工作组，而是毛主席指责的“镇压”逼得莘莘学子上了梁山。

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精神这时尚未传达到学生，但学生自发地认为自己就

是革命左派，对上级党委如中央已批判的原北京市委那样压制左派非常不满。中央发社论，“撕开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本来是批所谓资产阶级观念批彭真的，学生恰恰是从批所谓“三家村”和“四家店”，得出自己的体验，在初次感受的大规模政治压制里，要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安全。他们认为自己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组织不同观点的议论，受到限制；他们要求政治的一律平等，人人都能参加文化革命，但一批人一开始就觉得受歧视，似乎革命只是一部份钦定左派的专利；他们要求政治安全，反对监视和迫害，反对运动一开始就散布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抓右派，担心秋后算帐。一大批造反活跃学生，在党委和工作组的威慑下，的确感受到毛泽东斥之为白色的恐怖。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初，在他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念里，在他们一度激荡的民主革命的本能里，奇异地迸发出受压迫的平民，对第三等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怀念。他们一方面坚持多年来政治教养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方面情不自禁臆想人性；人道的原始要求，油然而生。他们对“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欧洲”并不熟悉，也不知马克思说过，这种共产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象毛那样读过卢梭，对于人权，他们从小只平凡认为“打人是侵犯人权”。他们也绝不知道，在1966年6—8月，他们本能上拥护的，居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髦人权教义。

也可能大家在批判资产阶级以来，真忘了1789年“人权宣言”讲的：“当人民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蹂躏的时候，对人民来说，起义是神圣不容争辩的义务”；罗伯斯庇尔为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的草案，就有：“一切政治组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然权利，并发展其一切才能”；“人的首要的权利是具备保持其生存和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平等地属于所有的人”。〔14〕非常有趣的是，造反学生在真正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旗前，实际上首先要回味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想实现的东西。他们为人权而抗争；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出现反抗工作组和学校党委的倾向和爆炸形势，部份学生如大家不断赞扬的那样，终于造反起义了。刘少奇最初担心的就是学生私下串联，会形成难以控制的结社；而马克思早就研究了法国革命和欧洲古代民主民族革命的关联，起义的权利是93年宪法的“最大胆创造之一”，而起义权在西班牙718年的古法典就已明确，“叫Privilegio de la Union（结社权）”。〔

15〕红卫兵的产生，特别是造反战斗队及红卫兵的产生，意味着反传统的结社起义权利的滥觞。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已流传出许多毛对限制人民政治自由的批评，学生才见到一年前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毛说：“资产阶级天赋人权，那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16〕造反学生抵制所谓“50天”的斗争，就是自认为争取起码的革命权的斗争。

在北京，学生与工作组的冲突起于66年6月初，邮电学院屡屡驱逐工作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强烈抵制工作组的行径，6月26日校园出现保工作组的游行，次日，工作组组织了浩大的斗争蒯大富行动。7月3日刘少奇亲自指示刘涛斗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对刘少奇表示强烈不满。21日陈伯达亲自支持蒯反工作组；接着，陈和江青又到北京大学公开支持聂元梓反对工作组。7月28日北大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宣告受上层支持的造反派对工作组（实质是对刘少奇）的初步胜利。8月23日，地院造反派学生一千人前往地质部静坐，要求揪斗工作组组长，毛表示了支持；8月24日北航造反学生静坐国防科委，又得到毛的支持，毛指示：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10月8日10日，农机学院、石油学院造反学生都通过造工作组的反，实现了夺取广播站和夺取运动的主导权。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组织省市领导去广州学习形势后，对省市1.5万干

部动员（6月5日），从“四清”工作队和省市机关抽调干部2402人，进驻宣传文教单位。7月31日也抛出郑州大学校长王培育。工作组和有些学校党委也错误的打击了贴大字报的学生。但是，刘建勋从8届11中全会回郑，省委立即按中央指示，于16日撤出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少数派的指示精神，省委决定支持群众组织中的少数派”，并以刘的名义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南地区的河南，一开始就走上另一条文革的道路。（17）

湖北的运动，5—7月都在王任重和省委严格控制下发展，一举横扫上起李达，下至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甚至高中学生）；并颇有独创地逮捕了百余名学生。王任重后来检查披露，刘少奇6月10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运动可能和57年差不多，要打三、四十万右派分子。学生反对省委工作组的想法，还仅仅埋藏在心里。7月底王根据北京形势变化，紧急电话指示在学生中的“反右”“反干扰”刹车。8—9月，大学生受北京影响，开始质疑省委前一阶段的方向，造反派不仅仅赶工作组，而且开始炮打省委；省长张体学组织了保卫省委的红卫兵，并且乘敞蓬车，着绿军装检阅了维护党的传统秩序的红卫兵。（参考武汉《革命造反报》）

湖南的运动，也在省委领导下进行。6月16日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毛在当日恰好住进韶山滴水洞。省委点了一些大学领导和教师的名，“派进各单位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会同原单位领导，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组织斗争。长沙等五市重点批斗三千多人，甚至逼死人命。8月，湖南大学学生走上街头，并和长沙市委组织的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9月，炮打各级党委形成热潮。中央决定调回张平化继任第一书记。然而，“刚从毛泽东身边回来的张平化，也并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应该打击谁和依靠谁。他仍然沿袭过去的斗争经验，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和此前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来领导这场运动”，“将前段揭发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喊炮打各级司令部的人，当作这次运动的对象”。全省大抓右派“黑鬼”，在新的白色恐怖下，造反学生、教师和干部工人赴京告状，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8）

到10月，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学生渐渐了解刘少奇在不得已的检讨中流露出的惆怅，刘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之后，别人仍然在犯同样的错误。（刘1967年7月给北京建工学院写的检查，说“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人从坚信无产阶级专政原理出发，显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犯错误去镇压群众。江青在11月27日送审的文稿，谈到这个问题，原文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毛加写了一段文字：“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份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19）江和毛改过的这一段话，当时造反学生认为完全符合实际；即便后来批判走资派和批资反路线压根儿就已变成荒谬，但没有学生认为，锋芒对准学生反会成为神圣。毛没有想到的是从反“资反路线”得到正名的大学生，今后竟会重拾所谓“资反”的压制人的武器。

到了大学生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凝聚造反的革命歌曲居然是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在5月，学生还是有组织地唱“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几乎是又一次反右的文化激励；但是，在文革一次次压制和镇压面前，青年人一把抓住凝聚共产革命党人的国际歌，他们在领会革命前辈的文化及心态；他们并不饥寒交迫，三年的困难日子已经过去，每月伙食费提升到13.5元，他们从事文化学习，军事体育和进一步发挥剩余精力都得到必要保证。但在思想和政治上，他们中有人感到自己仍是奴隶，是受罪的人，他们批判资反路线，就是为真理

而斗争。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比先辈参加的革命更为伟大的一次当代革命。他们也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实质上，他们已经把党分裂成两半，有一个真正革命的代表自己利益的共产党，还有一个不愿革命不能代表自己利益解救不了自己的党；他们把党委以及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指为工人运动责骂的虚伪的救世主，说明造反学生极左的观念，已不仅仅是鄙弃西方政治文化意识的“from, for, to”人民，而已对时政表示某种怀疑。

红卫兵从崇拜中共到革命造反，必然有一次痛苦的自我超越；至少要超越57年反右投下的阴影。诚然，这一超越早在学习“九评”，参加农村“四清”，和响应“到江湖河海去”的号召搏击恶浪时，就已暗暗积聚了能量。所以在“50天”阶段，“在毛没有公开他的姿态之前，群众动员就已经开始失控了。如果毛没有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代理领导，没有认可红卫兵，党有可能在当年夏季将形势控制住。但是，群众反对代理领导这一机会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20）中共搬起革命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我们崇尚多年的革命（农民革命、法国革命、十月革命……）所必然导致的暴烈。

从农民起义沿袭而来，从民主革命继承而至。学生不可避免用暴力推动了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造反。费正清认为，红卫兵“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性的舆论气氛中才胡作所为的。……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一脉相承……它代表了毛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1949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等于打开了地狱之门，毛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全面‘算总账’”。（21）有一点是大学生没估计到的，刘少奇忿忿不平的问题接踵出现：先是工作组，后来是党委自己，后来由军队出面，后来是造反学生自己也参加的一部份新生革命政权一革命委员会相继在运动中执行了压制一部份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摆脱这一政治文化定式；甚至红卫兵自己，一旦掌权，也迫不急待地压制，镇压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学生，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已经积极参与镇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运动。或许，大家都把政权当作了名副其实的镇压之权。红卫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左倾，起来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地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雄辩理由下进行的。本来十分理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观念，意外地却变得荒谬。使人想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谬”。只要是想问题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都已在现实生活 and 冥冥思考中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一次次询问一些当年比较自觉的红卫兵，想问题的红卫兵，如果让红卫兵上台将会如何？他们承认，他们“将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因为大学生的主要愿望就是为共产党的更加革命化而奋斗。文革的一个悲剧也正在这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学生，都避免不了这一政治历史的向心力。我们的全民族义无反顾地顺着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迹，走向极端革命的顶点。三十年后，能因为一代大学生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演出过这场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悲剧，去指责什么或者掩盖什么呢？

附注：

（1）《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P84

（2）《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P74

（3）同上，P89

（4）周泉纁，“我心中的文革”，1999

（5）《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P165

（6）同上，P338—344

（7）同（1）

（8）同（2）

- (9) 同(3)
- (10) 同(2) P 117
- (11) 肖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P 289
- (12)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P 101
- (13) 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P 377
- (14) 《毛泽东思想万岁》(5)，1968，P 266—267
- (12) 《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 (13) 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辑自《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P 49
- (14) 《罗伯斯比尔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P 164
- (15)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第10卷，P 494
- (16) 《毛泽东思想万岁》(5)，1968，P 243
- (17) 《河南省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P 190—192
- (18) 《当代湖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P 243—246
-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P 164
- (20) 王学伦，《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P 203
- (21) 同上，P 189，引自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叶森树（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 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6.135.33.5\]: pub/hxwz](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ftp://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